唱好这个时代的“一台戏”

牛智贤

近日，读到一篇纪念赵树理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文章，题目极富画面感——《赵树理：“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光明日报》2026年3月27日16版）。文中引述汪曾祺先生的回忆，说赵树理赶集时，“口念锣鼓，拉过门，走身段，夹白带做还误不了唱”，真真是一人便成一台热闹的戏。这生动的描摹，瞬间将我拉回一年前参加“重读赵树理”活动的情景。那时获赠一本《赵树理小说散文集》，闲暇翻阅，字里行间，一位血肉丰满、扎根泥土的艺术家形象愈发清晰。而今，“一人一台戏”这五个字，仿佛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重新理解赵树理，乃至理解文艺与人民、传统与时代关系的一扇门。

这“一人一台戏”，首先是赵树理生命底色里自带的锣鼓点。他的艺术启蒙，并非来自象牙塔内的经卷，而是晋东南乡野间最鲜活的气息。父亲是“八音会”的顶梁柱，田间地头“父拉子唱”，那是融在血脉里的民间韵律。少年赵树理为看戏能跑十里地，寒冬清晨赶驴卖炭，心里想着白袍罗成，嘴里哼着上党梆子来驱散恐惧与严寒。戏曲于他，从来不是外在的消遣，而是生命本身的呼吸与力量，是“激烈、痛快”的山野精气神。这深入骨髓的民间滋养，使得他后来的所有创作，都自带一种土地的温度与节奏。哪怕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他担任剧团团长，将旧戏中才子佳人的哀婉，淬炼成《邺宫图》里的壮烈爱国情怀；在群众面前，他能手脚并用为乐器，扯棉絮当髯口，用最简陋的形式点燃全场热情。这时的“一人一台戏”，是从民间土壤里生长出的文艺武器，是一个灵魂用他最熟悉、最炽热的方式，去唤醒、鼓舞更多灵魂。

进一步想，他的“一人一台戏”，更是一种自觉的、完整的文艺创作观与践行。这“戏台”，不限于锣鼓丝弦的实体舞台，更延伸到了他笔墨耕耘的文学天地。他擅写小说，开创了“山药蛋派”，笔下尽是“小二黑”“李有才”“田寡妇”这样从泥土里滚出的名字，故事无非是婚姻、生产、合作社里的是非曲直。然而，这朴拙背后是巨大的尊重与深刻的洞见。他曾说，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不一定是“艺”盲。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他摒弃了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而是坚信农民自有其生活智慧、实践经验和审美能力。他的写作，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讲他们关心的“理”和“事”，从而叩响他们心中的“艺”的共鸣。于是，他的小说结构，暗合说书艺术的起承转合；他的人物对话，是提炼过的、带着露水气的乡音。他的“戏”，是写给最大多数农民看的、听得懂的戏。不仅如此，他的“戏台”是流动且跨界的——小说、戏剧、散文、曲艺、评论，何种形式能最有效地承载内容、抵达大众，他便操持何种“乐器”。写《三里湾》是用小说描摹变革的长卷，编《十里店》是用戏剧进行直接的宣传，作《实干家潘永福》则是以散文记录身边的楷模。在他心中，文艺的“雅俗”壁垒是虚幻的，唯一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这何尝不是一种“一人”驾驭“多台戏”的卓越能力？每一种文体，都是他“唱戏”的一个行当、一种声腔，共同演绎着“乡土中国”的宏大叙事。

在新大众文艺背景下，我们面临的媒介环境固然空前复杂，但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基本命题并未改变。赵树理的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大众化”，绝非简单的迎合或俯就，而是基于深刻文化自信的双向奔赴。他对上党梆子爱到“能跟你拼命”，那是认同之根；他又能广泛涉猎其他戏曲博采众长，那是自信之下的开阔。他的“大众化”，是“化大众”与“大众化”的统一，是在提升民间文艺精神境界的同时，从中汲取磅礴的创造力量。他塑造的“乡土中国”，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幻梦，而是充满矛盾、进步、汗水与希望的坚实大地，这份对自身历史与现实的诚实书写，正是文化自信最扎实的基座。

“一个人能唱一台戏”，赵树理先生唱完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大戏，余音绕梁。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部作品，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方法：像他那样，将个人的才情深深扎进生活的泥土，从人民创造中汲取养分，再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唱出时代的旋律。这或许就是，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接过他的锣鼓，继续唱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一台戏”的宝贵心法与深沉力量。

阿喀琉斯是神更是人

邱雨轩

“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愤怒！”《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开篇一句神谕般的呐喊，让阿喀琉斯这位古希腊战神的形象，定格在毁天灭地的英雄气概中。阿喀琉斯无疑是超凡战力的化身，是个人荣誉的极致追求者，是西方美学中“崇高”的具象化。但当我们从时光长河的彼岸，细细回望这个高大的身影，就会发现，英雄的光环之下藏着一颗凡人的心——爱、脆弱、悲悯，还有优美的泪水。正是“优美”与“崇高”的碰撞、融合，让阿喀琉斯的形象不再单薄，而具有穿越时光的厚重与复杂，直击当代人的内心深处。

阿喀琉斯崇高美感的生成，离不开他在愤怒中对超凡战力的收放自如，也离不开读者对他愤怒原因的深刻共情。当阿伽门农强夺他的战利品时，他感到尊严受辱，便以罢战作为决绝的抗议。他用缺席宣告自己的不可替代，让希腊联军在特洛伊人的攻势下节节败退，这种静默的威慑力，比直接的暴力更令人战栗。而挚友帕特洛克罗斯战死的消息，让这份内敛的愤怒彻底爆发——他披上神明打造的甲胄，战吼震彻战场。他所具备的如自然灾难般的破坏力，让我们深感自身渺小，却又不自觉地被这股“洪荒之力”所吸引。而我们之所以能被吸引，是因为我们能理解阿喀琉斯的行为。这种基于理性认知的理解，让我们与史诗中的暴力场景保持了恰当的审美距离，最终在他收放自如的伟力与清晰可感的动机中，体会到这份直击心灵的崇高之美。

但若阿喀琉斯仅仅是一台无情的战斗机器，为何三千年后的我们，仍会为他悲伤、受他感动，同情他，甚至为他落泪？如果说阿喀琉斯坚硬的盔甲、受银河洗礼而无孔不入的身躯、强大的战斗意志是崇高的显化，那么伟力深处蕴藏的一颗同样脆弱的、悲悯的、属于凡人的心，则是优美的象征。阿喀琉斯的全部魅力，正在于他内心那场“崇高”与“优美”的激烈交战与最终融合。崇高与优美的烈火，最终淬炼出人性的光辉。

当看到挚友帕特洛克罗斯为战事落泪时，阿喀琉斯温柔地将他比作“要妈妈抱的小姑娘”，给予他安慰；而当这位钢铁般的战神遭受屈辱时，也会独自跑到海边，向母亲忒提斯哭诉，就像一个无助的孩童。而史诗最动人的结尾、“优美”融化“崇高”的象征，就是赫克托尔的父亲普里阿摩斯深夜潜入希腊军营，抱住阿喀琉斯的双膝，虔诚地亲吻他那双杀害了自己众多儿子的手。“想起你的父亲，他也像我一样站在悲惨的暮年门槛上”，老父泣血的话语，让阿喀琉斯从复仇的狂热中惊醒，他在普里阿摩斯佝偻的身影里，看见了未来自己父亲的悲恸，看见了战争中所有丧子之父的苦难。最终，他在河边亲自涤荡仇敌赫克托尔的尸体，将其归还给特洛伊人，实现了爱与悲悯的回归。

阿喀琉斯的愤怒并非终点，而是淬炼人性的过程。起初，他的崇高带着毁灭的锋芒，但在爱与悲悯的滋养下，这份力量逐渐褪去暴虐，有了人性的温度。他不是单纯的“神”，也不是纯粹的“人”，而是在神性与凡性的拉扯中，达成了“英雄即凡人”的自我和解。这种辩证的融合，让他摆脱了扁平的英雄标签，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

当我们站在三千年后的语境中，重新捧起这本《伊利亚特》，仍能从阿喀琉斯的故事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在这个推崇个人成就的社会，我们何尝不渴望彰显自我价值？但阿喀琉斯的经历提醒我们，不受约束的“崇高”会变成伤人伤己的利刃。真正的强大，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拥有力量却不失同理心，懂得克制自我与尊重他人。在这个冲突频发的世界，阿喀琉斯与普里阿摩斯的和解，给出了超越暴力的答案。和解不是遗忘仇恨，而是看见彼此共通的命运——我们都是会失去、会痛苦的凡人。共情，正是化解矛盾的关键。这对当下的我们依然适用：无论是人际的摩擦，还是观念上的分歧，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执念，往往能打破仇恨的循环。

《伊利亚特》吟唱的不只是一个古希腊战神的故事，更是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与成长。阿喀琉斯在愤怒的熔炉中淬炼出的人性之光，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英雄史诗，不是关于力量的炫耀，而是关于人性的觉醒。当我们在欲望与道德、自我与他人之间徘徊时，这个三千年前的英雄早已给出答案——唯有让崇高的力量承载优美的人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

赵树理文学奖 获奖者言⑧

创作是一种角色转换

石国平

作者介绍：石国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山西文学》《黄河》《火花》《青岛文学》《都市》等刊。出版小说集《碎片飞扬》《花开无序》、散文集《滋味》《温暖以待》。《我拿什么拯救你》获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追溯一篇小说的创作源头或动机，其实很难。创作的起因也往往是一种灵感乍现。我写《我拿什么拯救你》（《黄河》2022年第2期），源于朋友咨询我的一件事。恰好在那个时间段，有人给我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叠加在一起，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创作灵感。

在小说里，讲故事的人和我，变成了一对儿闺蜜。彼此在一个小圈子里，各怀心事，明争暗斗，比工作、比职称、比丈夫、比前程，还比漂亮，更比优雅。两人因嫉妒心而起异心，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的阴暗处。我把主人公写得很“正”，包括她的品格。恰恰是这么一位女性，却陷入丈夫背叛、贪腐被抓这一既尴尬又棘手的困境。丈夫被“留置”后，她期望通过闺蜜得到其丈夫的帮助，闺蜜却把主人公丈夫与小三儿的隐私讲给她听。小说的结尾，闺蜜的丈夫同样“进去”了。两个性格不一、品格不同的女性，结果却是殊途同归。

“文学始于地理”，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学创作也只能在特定的氛围中发生。这是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地理因素对创作者的影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作家往往会被工作、生活的环境所影响，作家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地域文化特色和他的写作习惯。作家所经历的一切，包括眼前的山水草木，都会以某种特定的场景呈现出来。文学作品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展现作家对故土乡情的某种情绪化的抒写。这既是一种独特的个体经验，同时也是地域性文化因素的艺术再现。我的小说多以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为素材，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用某个独特而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情感脉络来呈现生活的某种常态或异质。我的小说读起来特别像写身边的某个人、某个场景。作品中常常会有意植入一些地域性的历史文化符号，以此增强小说的地域性特色。

写作是作家把生活中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喜欢或者憎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创作的成功。如果故事清汤寡水、人物平淡无奇，那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写作。

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具个性化和私密性的劳动。写作之于我，始终是业余爱好。以平淡之心坚持写作，能写就写，顾不上就先放下来，让创作欲望暂时冷却。文学写作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努力的过程往往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文学之路很漫长，成功又往往是一步之遥。我一直在试图做一种努力，那就是学着在纷繁中让内心冷却，在空寂中使自己感受到一种足够的拥有。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工作、生活、写作这三种状态中游走。当处于工作状态，为人做事要考虑方方面面，要顾忌一些事情，要遏制一些情绪，不惹人嫌，不扎人眼，不使人烦。当处于写作状态，思绪就会一下子变得零乱起来，感性起来，内心就似那渐次打开的花瓣，温润而多姿多彩。当一些思绪在键盘上飞扬，当文字被击打出来的时候，心情往往是无比畅快的。当置身于生活状态，就又开始条理起来。生命中乐于拥有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合情合理，不合理的又往往极为精致和难以释怀。不贪恋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不盲目追逐与自己能力不匹配的生活，在自己喜欢的状态里行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写作成了我工作、生活之余的一种消遣，成为角色转换的一种方式，也是生活中自我调整的途径和空间。文学创作让我收获了一种内在的满足。有时候它就是一种个性化的情绪释放。生活往往不及想象，写作可加以填充和拓展。写作可以弥补生活中的缺憾，可以回味过往，带来某种内心的愉悦。写作可以与一些美好不期而遇。

始终有一种蓬勃生长的力量在内心涌动，这股力量就叫“喜欢”。对一位写作者来说，要的就是这种莫名的喜欢。因为喜欢，把美好的时光消磨在那些文字上，让自己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写作带给我不少快乐和满足，也给予我一种信念和期待。我先后出版4本书，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在职场，多数人不晓得我在写作，也从未因写作影响本职工作；身处文学圈的时候，人们又往往忽略我还是一个职场中人。文学写作丰富生活，充盈内心。文学写作拓展了我的朋友圈，提升了我对生活的认知，工作也涵养了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与工作互为表里，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我遵从随缘而行。与文学相遇，是我的幸运。生活中所有的相遇都是文学的富矿，它或者清新或者灰暗，都是生活所赐。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枝枝蔓蔓都会潜入我的内心，化为我的文字。我钟情于写作，更挚爱生活。文学映照生活，也引导生活。文学给予我生命中许多额外的奖赏，我将一如既往地珍视它，并与之相依相伴，一路向前。

地域根性与人间温度交织

——曹永红诗歌近作浅析

王春林

与那些总是会少年成名的诗人相比较，人到中年才开始诗歌创作的曹永红，恐怕只能被看作是半路出家的诗人。既然是半路出家，那就更需要有极大的决心、毅力以及对诗歌最赤诚的爱。《你要写一首诗给她》一诗便道出了诗歌带给她的收获与喜悦：“你要写一首诗给她/长短随意/内容和形式，亦不受限/唯一的要求，拒绝假意/行走，是记忆，是复活。”肯定是出于这样的一份内心的热爱与对记忆的珍视留存，才促使她在十余载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三本诗集。仔细玩味近年出版的《人间芳华》（三晋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与《一个发芽的季节》（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两本诗集，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清晰触摸到构成其作品内核的多重“风景”。

第一重风景，是深植于诗人血脉的三晋大地。这片被太行、吕梁两山环抱，黄河、汾河两水滋养的土地，因其自古以来所拥有的厚重文明积淀，自然会成为诗人创作的精神原乡与身份底色。《黄河》《汾河流水的日子》《汾河水库》等诗作对黄河与汾河反复吟咏。在她的笔下，这两条滋养生命的水源，既是可触可感的自然景观，也是承载乡愁的载体与书写生命的核心意象。“你一次次地完成契约/用精血和乳水灌溉田地、莳养五谷”“汾河水以慈悲/抚摸着平川、石头和山峰/流水莳养着田园”。其中的每一行，都带有“水”所特有的温润与厚重。在对自然景观描摹涂写的同时，诗人的笔触更是接续三晋千年文脉，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晋商女儿（组诗）》《晋祠周柏》《平遥古城遐想》《游常家庄园》《寻访雁丘》等篇目，并非简单的怀古咏史，而是以“游记”式的个人感悟，将山西千年文脉与个体生命体验深度相融，让文字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历史厚重感。

第二重风景，是平凡市井生活里的烟火气。如果说三晋大地是她诗歌创作的根，那么烟火人间则是她诗歌的魂。必须看到，诗人始终秉持着为平凡者立言的初心，将目光投向最普通的市井众生，试图在平淡的生活里打捞属于普通人的“诗情画意”。两部诗集中，收录了大量聚焦不同行业劳动者的篇目：《仁者之心》致敬在疫情时期挺身而出的李文亮医生；《异域人生》的视野瞄准的是在城市里辛勤劳作、背负家庭重担的农民工群体；《卖菜的大叔》《修车师傅》《值夜保安》《快递小哥》《修鞋女人》《背夫》《写给志愿者》等作品里，诗人始终以共情而非俯视的视角来书写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既不刻意渲染苦难，也不居高临下地滥施怜悯，诗人只是真诚地凝视他们身上闪耀着的那些人生微光。这份对世间众生的平等观照与真诚尊重，让作者的诗歌拥有了深厚民间根性的同时，也让这些平凡的身影成为人间最鲜活的风景。与此同时，作者更擅长为细碎的日常生活片段赋予诗意，《失眠》《阳台（外二首）》《旧照片》《南瓜饼》等作品，将失眠的夜晚、阳台的光景、旧照片的回忆以及一餐一食之间流动的温情尽数纳入诗歌的场域。“人间有味是清欢”，在她的笔下，诗意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似乎一直掩藏在最朴素的日常烟火里。

第三重风景，是由外而内抵达的生命风景。正如明代徐祯卿在《谈艺录》中所言“诗者，天地之心，性情之奥府”，诗歌从来都是创作者向内观照、在文字中找寻自我的核心载体。与徐祯卿的言论遥相呼应的，是曹永红在《与己书》中的诗句：“静下心来，自己给自己讲一段故事/然后用文字表述，生动感人。”在曹永红的这两部诗集里，《人间芳华》更多是向外看到广阔的人间风景，《一个发芽的季节》在向外延伸的同时，萌生出更多向内探索的勇气，进而完整塑形从看见世界到自我关怀的精神进阶。事实上，两部诗集中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创作隐线，那便是诗人对时间与生命本质的持续探寻。《一个人的体内》《光阴的价值，是一种寂静的白》《落日》已经开启了诗人对时间流逝、生命本质的探寻。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她的思考从对时光流逝的怅然感慨，逐步转向了对生命成长的主动把握。《一个发芽的季节》《追光的日子》《调色板》诸首，将对时间的感悟与生命的成长相融，用鲜活的意象完整勾勒出生命觉醒的脉络。与此同时，从诗歌创作伊始，诗人便在诗歌中尝试与自我、与世界进行对话，从《邂逅与远方》《心中的秘境》到《与自己和解》《灵魂的噪音》，书写个体在尘世中的迷茫、挣扎、接纳，这种向内求索的创作轨迹与其个体日常生命体悟深度同频，使她的诗歌不仅有向外的视野广度，亦具有向内的精神深度，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共鸣的方式回望自身的内心成长轨迹。

曹永红笔下的“风景”之所以动人，更在于她独有的审美表达，用女性视角的温柔悲悯为底色，以古典审美意境为内蕴，再加之质朴、真诚的语言，让她眼中、心中的风景有了直抵读者内心的强大力量。她的写作自带女性独有的细腻、敏感与共情力，笔锋柔和不失英气，笔触伤感不失坚韧，正如其在《李清照》中所写：“在花海中寻路/在忧伤的月光里漾起愁苦/何处再把酒盏。”与此同时，她还接续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除了在《三晋诗人（组诗）》《古代诗人（组诗）》中与王维、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诗人展开跨时空对话，《中秋明月》《话端阳》《小满》《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组诗）等作品，更以四季流转、节气更迭对应生命的起伏，用现代笔法延续“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诗学传统，让诗作既有古典的含蓄意境，又融入现代生活质感。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她的诗歌没有晦涩难懂的技巧堆砌与小众的文字游戏，落笔大方、语言朴素清澈，这份不事雕琢、发自本心的真诚，真正实现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让诗歌回归抒情的本质，也让她笔下的风景拥有了最动人的本真模样。

经典漫谈（95）

我觉得文学是一种心有不甘的表现，人世的稀缺和忽略，才应该是它最热切的关注，因为它有无限扩张的幻想，有力挽狂澜的愿望，有起死回生的功能。人生最难的并不是坚韧地活着，而是坚韧地爱着，并相信，挚爱的尾声里没有落空，其中毅力和勇敢，以及深思熟虑，都应该是爱情最为牢靠的基石。 ——杨志军

我赞成探索“边界”，但不赞成建立新的统一的体系或规范，就是说，其探索或者实验限制在个人范围内我无话可说，若推而广之我就怀疑。而且我认为实验本身并不是文学写作的目标。形式、方法、手段上的实验是为了更有效地揭示个性的特别，以便抵抗普遍性的阅读套路。 ——韩 东

作家谈艺